

为解放军炮弹安上『眼睛』的天津地下党

重要贡献。

在天津战役中给解放军做向导。

1月初，当解放军开始攻打天津外围之际，天津市委向市内地下党组织布置任务：给解放军带路，协助我军掌握敌人碉堡和军事目标。战役中，熟悉市内道路的地下党为解放军带路，积极配合解放军的进攻。为了方便辨识，带路的地下党员要求统一着装，穿上白球鞋，在左臂扎上红色布带。1月15日凌晨1时，地下党员何其浩带领一支解放军巷战部队，从西广开边打边进，历时5小时，战斗10余次，一直到达六里台。1月15日中午，为解放军攻打耀华中学带路的，有广东中学地下党员孟宪珩、特一中学教师党员蒋志诚、北洋大学学生党员高光国等。更为突出的是，隐蔽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身边并担任警卫连连长的地下党员王亚川，带领解放军从司令部地下室里活捉了陈长捷、副司令秋宗鼎及其他将、校军官7人。天津市市长杜建时的新闻秘书方纪文，向解放军提供了杜建时藏匿地点等重要情况，为东野第9纵队（46军）抓获杜建时争取了时间和条件。有的地下党员主动为解放军带路攻打守军或一起搜捕散兵游勇，好多人并没有留下姓名。正是有这样一支坚强的英雄群体，人民解放军才能在29小时内全歼天津守敌，使天津快速获得解放。

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统战工作是地下党员为天津解放所作的贡献中最为突出的一项工作。天津地下党特别注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宣讲党的城市政策，动员他们保护工厂、企业。例如，黎智对民族资本家李烛尘、杨亦周开展工作，天津工委市政委员会委员李定多次与周叔弼、李烛尘接触。另一方面，耐心地对文化、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开展思想工作，通过他们团结更多的群众。例如，黎智、魏克、李之楠等天津工委的负责同志，与南开大学教授会主席肖采瑜、教务长吴大任、秘书长黄钰生等分别谈话，李之楠、李定等还分别对医务界知名大夫方先之、朱宪彝、雷爱德，新闻界著名编辑张琴南等人做思想工作。天津知识界和社会上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起各种进步组织。比如，在新闻界建立天津记者协会，在工业界组建天津工业协会，在金融界建立天津银行公会，广泛开展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党组织通过这些进步组织开展统战工作，进一步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除此之外，天津地下党还通过各种渠道，对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物开展团结和争取工作。如通过傅冬菊做争取其父傅作义的工作，通过曾常宁做争取其父曾延毅的工作，通过刘抗生做争取其父刘厚同的工作。在天津党组织的努力下，争取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物的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黎智对社会局局长胡梦华做工作，使该局档案完整地保存下来。天津工委企业党委书记王文化同天津电业局正、副局长和供电科科长、工程师等做工作，保证了解放前后市内的电力和电讯畅通。

开展反对南迁和护厂护校斗争。

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天津高等学校、重要工厂和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一律南迁。反对南迁和护厂护校成为地下党和天津各界人士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各工厂企业、各高校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稳定群众的情绪。黎智向民族资本家杨亦周揭露蒋介石南迁的阴谋，杨亦周接受党的任务，对南京政府的电令一再拖延，使当局的企图落空。李烛尘提出了南迁的许多实际困难，拖延不采取行动。黎智与魏克等天津工委负责人秘密会见了南开大学负责人，请他们抵制南迁，保护学校。女师学院和河北学院地下党组织通过学生会和各社团的积极分子，运用座谈会、出海报、呼吁书等形式痛陈南迁之弊。

地下党员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校相继作出了反对南迁的决定。1948年12月5日，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了学校不南迁的决议。物理系主任、教授张荫藩说：“北洋大学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绝不能把这个美誉毁在我们手中，可不得轻举妄动啊！”在反对南迁斗争之后，天津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技术人员、学生、教师开展了护厂、护校斗争，成立纠察队、护厂队、护校队。工人与进步教师学生并肩战斗，保障了工厂和学校的正常运行，保护了工业生产设施与教学研究设备的安

全，为天津工业教育和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夺取解放浙南全境的光辉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成立纪念碑碑文敬读

□ 何建瑞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成立纪念碑位于浙江省瑞安市湖岭镇板寮村，始建于1993年。纪念碑高1.68米、宽0.9米，为花岗岩材料制作，立于六柱石亭的正中间。纪念碑正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题写碑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成立纪念碑，背面刻有《碑记》，全文如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浙南人民长期坚持武装斗争道路，创建游击根据地，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对（动）派发动内战，为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共）浙南特委在驻地板寮奉命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龙跃任司令员兼政委。先后解放泰顺、玉环、温州、文成、瑞安、乐清、平阳、青田、景宁、温岭、黄岩，并配合野战军解放福鼎、柘荣、寿宁。历经大小战斗一百九十余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部队发展到一万余人。一九四九年八月，改编为浙江军区第一警备旅和第五军分区，完成历史使命。

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缅怀先烈，特立此碑，永志纪念。

中共瑞安市委
瑞安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碑文简要记载了浙南游击纵队成立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战绩。敬读碑文，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场景浮现眼前，多少英雄血染河山，让人不禁潸然泪下，肃然起敬。

浙南游击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

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浙南游击纵队正是由挺进师在此播下的种子而成长起来的。1947年夏，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此前不久，经华东局批准，浙南特委归属闽浙赣省委领导，浙南的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全国大反攻，浙南特委提出扩大革命武装力量，把武装斗争和发动群众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此，于1947年10月3日至29日，在瑞安县高楼区梅山长湾召开浙南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明确提出：组织与动员一切力量，发动武装斗争，配合前线作战等任务。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部队作战，会议决定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

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和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8年9月27日，闽浙赣省委报经华东局批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瑞安县桂峰乡板寮村正式宣布成立，龙跃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郑丹甫、政治部主任胡景城、参谋处主任张金发。浙南游击纵队的成立，标志着浙南游击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

打了解放浙南的全新局面

为加速游击战争的胜利进程，有力配合大军南下作战，浙南游击纵队在闽江南北两条战线发起强大攻势，打了解放浙南的全新局面。

在闽江以南战线，以游击纵队第一支队为主力，各部队全线出击，连战连捷，在泰顺取得了攻城打援的重大胜利。1949年2月17日，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和浙南第二、第三县队从距离泰顺县城10余公里的大岗背村出发向县城挺进，并于深夜发起攻城战斗，敌军负隅顽抗。至18日拂晓，浙南游击纵队控制了城内国民党县政

“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如何做群众工作

□ 李永军

用生动的方式宣传群众，被称赞为“出色的鼓动家”。当时海陆丰的农民对于生活贫困的问题，普遍认为“这是天命使然”“没有得到好风水”，都觉得种田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彭湃把从日本带回来的留声机作为宣传工具，有时拿到十字路口的榕树下播去播放，有时在晚上农民有空闲的时间带到村子里去播放。留声机对于当时的乡村来说是一个新奇的东西，吸引了不少农民前来赏听。他就趁机演讲，宣传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的革命道理。彭湃用“耕田亏本”的具体计算，揭示农民痛苦的根源，让农民群众认识到导致他们穷苦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地主的剥削。当时，许多农民对加入农会犹豫不决。彭湃比喻说，加入农会好比过河，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过……加入农会，即是联合过河，手握手地进行。彭湃还不断增强群众工作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根据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实，创作了《田仔骂田公》等歌谣，教农民们传唱，取得广为流传的宣传教育效果。瞿秋白1932年在《红色海丰》一书中称赞彭湃是“出色的鼓动家、宣传家和组织者”。

关心群众疾苦，农民感激地叫“彭菩萨”。彭湃搞农民运动，引起家人的不理解，因此，他的兄弟与他分了家。彭湃就把分给他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表示谁耕种就归谁所有。可是佃户们却不敢接受。彭湃别出心裁，在家门口搭台请农民看戏。他拿着自己所有的田契走上戏台，当众烧毁，大声对佃户们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了！他带头革了“自

家的命”，赢得了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农民们感激地称他为“彭菩萨”。彭湃想方设法以农会名义为农民群众谋利益。海陆丰当时有个传统风俗：谁家死了人，亲友、邻居、村人都要来聚餐大吃一顿，多数农民苦不堪言，穷苦人家为了请客还得借高利贷来应付。针对时弊，彭湃组织农会发起成立了一个济丧会，哪个会员家里有人去世，都由济丧会会员挪出两毫钱来济丧，帮助解决无钱送葬的困难，并为死者举行追悼会，会员们只参加悼念，不去死者家中吃喝，使丧事办得俭朴节约，这个做法深得人心。

1939年陈云在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革命时彭湃同志在海陆丰，为什么受农民的拥护，为什么他在农民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因为他关心群众的疾苦，随时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探索群众工作规律，成了“农民运动大王”。1942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赞赏彭湃循循善诱做群众工作的方式。他说：彭湃为了做农民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农民把他看成自己人，听他讲革命道理，他家乡的农民运动就发动起来了，他本人成了农民运动的大王。

当时海陆丰的农民信奉菩萨等，彭湃开展农民运动时，明白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努力把握和尊重农民的迷信特点，注意不冒犯他们膜拜的神灵，以接近群众并取得群众的信任。等到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后，彭湃循序渐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教育群众破除神权迷信，教育引导群众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效果甚佳。1920年代海丰各乡各姓有乌旗和



安、乐清、平阳、景宁、青田、温岭、黄岩和福建的福鼎、柘荣、寿宁等14座县城，夺取了解放浙南全境的光辉胜利，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书写下辉煌的一页。1949年8月，浙南游击纵队奉命改编为浙江军区第一警备旅和第五军分区，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浙南游击纵队和浙南优秀儿女，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抛头颅、洒热血，面对敌人的“围剿”沉着坚定，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潘广海、孙纪芳、潘德金、杜宝池、李毓芳等一批浙南游击纵队烈士，以血肉之躯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红旗之分别，时常发生械斗，械斗时只认乌旗或红旗不认亲疏。为了消除农民的乌旗和红旗对立的观念，彭湃精心设计了象征农民联合的海丰总农会会旗为红黑两色分四块对角做成的

一面大旗，号召会员共同团结在农会的旗帜下，以勇敢斗争精神来干革命。海丰县自从有了5万户25万人的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长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勒索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肯定海丰农民运动的成就，指出：“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样好的政治局面，充分表明彭湃卓越的群众工作能力。

彭湃注重总结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及时上升为理论和原则，用于指导新的群众工作实践。1926年彭湃写成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他在几届广州农讲所讲授的专题就是此书的内容。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了海丰农村的阶级状况以及农民所处的地位，系统总结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农民运动的开展提出了许多带有规律性的见解。该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重要著作，它的发表对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全国农民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